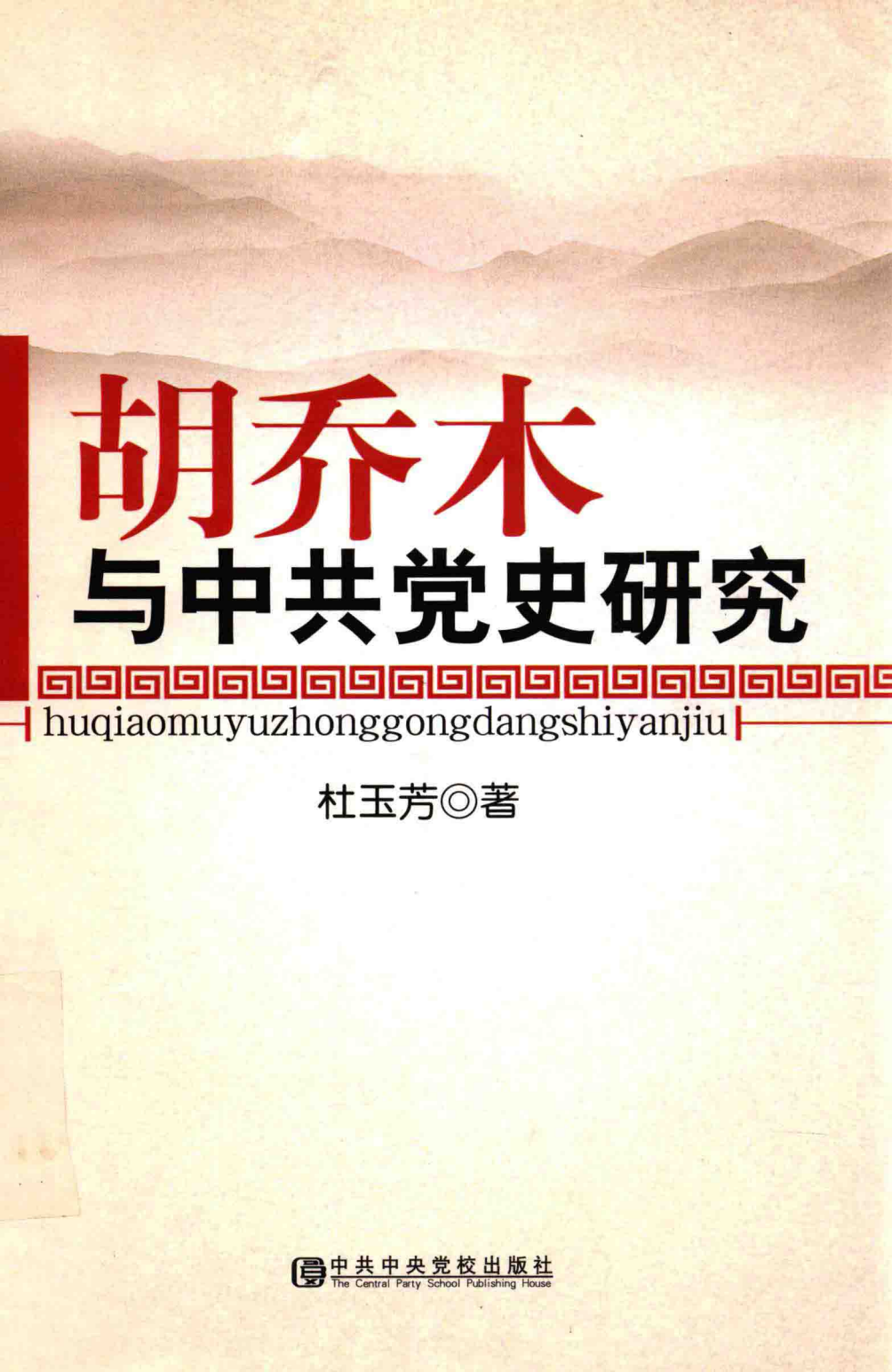




胡乔木 与中共党史研究



| huqiaomuyuzhonggongdangshiyanjiu |

杜玉芳◎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胡乔木 与中共党史研究

— huqiaomuyuzhonggongdangshiyanjiu —

杜玉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杜玉芳著. —北京: 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035-3913-8

I. 胡… II. 杜… III. ①胡乔木(1912~1992)-生平
事迹②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史料 IV. K827=7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8663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印张: 8.875

字数: 24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的意义	(1)
二、研究现状述评	(5)
三、研究的学术创新性	(8)
四、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	(10)
第一章 胡乔木的党史之路	(13)
第一节 “少年投笔依长剑”：胡乔木沿红色之路 走向党史	(14)
一、读书求知	(14)
二、革命征程	(17)
三、走向党史	(19)
第二节 “红墙有幸亲风雨”：胡乔木党史研究的 起步和奠基	(21)
一、胡乔木党史研究的起步 (1941—1945 年)	(22)
二、胡乔木党史研究的奠基 (1951 年)	(24)
三、幸亲风雨与胡乔木党史研究的起步和奠基	(26)
第三节 欣逢盛世再伏枥：胡乔木党史研究的高 峰和纵深发展	(29)

一、胡乔木党史研究的高峰(1976—1987年)	(30)
二、胡乔木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1987—1992年) ...	(33)
三、欣逢盛世与胡乔木党史研究的高峰和纵深发展	(35)
第二章 胡乔木的党史工作	(39)
第一节 参加起草党的两个历史决议	(39)
一、参与起草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	(40)
二、负责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	(43)
第二节 指导党史“正本”的编撰	(54)
一、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修改	(54)
二、指导《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	(57)
第三节 开创党的文献和国史研究工作	(63)
一、开拓党的文献工作	(63)
二、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70)
第三章 胡乔木的党史论著	(76)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76)
一、《三十年》的史学成就	(77)
二、《三十年》的风格特点	(82)
三、《三十年》的一个重要“副产品”	(90)
第二节 “党史三论”	(92)
一、《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	(92)
二、《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	(96)
三、《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01)
第三节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103)
一、基本性质和内容结构	(104)
二、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	(105)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108)

第四章 胡乔木的党史理论 (111)

第一节 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 (112)

一、党史研究的理论 (112)

二、党史研究的原则 (119)

三、党史研究的方法 (124)

第二节 关于党史编撰的原则和方法 (138)

一、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138)

二、夹叙夹议，有质有文 (141)

三、杜绝沉闷，有声有色 (143)

四、陈言大去，新意迭见 (147)

五、客观公正，力避武断 (150)

第五章 胡乔木的党史观点 (154)

第一节 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

新评价 (154)

一、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155)

二、关于毛泽东思想 (159)

第二节 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分析 (166)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66)

二、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 (172)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174)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新论断 (175)

第四节 对党内路线斗争的新提法 (178)

第五节 对“左”的新见解 (182)

第六节 对建国后党史分期的新设想 (187)

第七节 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197)

第六章 胡乔木党史研究的特点、地位、作用和启示	(207)
第一节 胡乔木党史研究的特点	(207)
一、史料价值与理论价值的统一	(207)
二、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209)
三、现实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214)
四、思想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217)
五、成果多以谈话的形式存在	(220)
第二节 胡乔木党史研究的地位和作用	(222)
一、在自身学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223)
二、在党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227)
三、胡乔木党史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234)
第三节 胡乔木党史研究的启示	(239)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理论修养,深化党史研究	(239)
二、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繁荣党史学科	(242)
三、改进写作方法,借鉴文学手法,提高写作水平	(244)
四、学习前辈精神,立足自身努力,走好党史之路	(247)
附录一: 胡乔木主要党史活动和党史论著年表	(251)
附录二: “银艾非吾事”	
——胡乔木晚年心境的诗词解读	(256)
主要参考文献	(261)
后 记	(269)

绪 论

一、选题的意义

本课题从性质上来说，既属于党史人物研究范畴，也属于史学理论研究范畴，是二者的交叉；从内容上来看，既研究胡乔木的党史思想、党史理论，也研究胡乔木的党史活动、党史实践，是二者的综合。它的意义也从对人物研究、理论研究、党史实践三方面的作用中反映出来。

意义之一：有助于深化对胡乔木的研究

胡乔木是一个重要的党史人物，本身就是党史学研究的对象。胡乔木一生经历独特，学识渊博，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先任毛泽东的秘书，再当邓小平的助手，后来自己也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他一生代党立言，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文件，被邓小平誉为“党内第一枝笔”；他编辑整理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为阐述、发挥、宣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党的思想文化和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担任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职务期间，既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又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思潮，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思想文化工

作；他还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诸多学科上都有高深的造诣和独创的见解，其中最为卓著、最具开创性的领域是中共党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堪称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奠基者、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推进者和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的先行者。独特的经历、广博的学识、对真理的不倦求索和对党的事业的无私奉献，使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独有魅力和光彩，对此，胡绳先生曾说：“在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汹涌浪潮中，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和成长起来许多杰出的人才。但是像胡乔木同志这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深的理论修养，并曾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在多种科学领域内具有广博的知识，勤于思考，敢于独立地提出新的见解，把自己的一生卓有成就地献给党的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这样的人至少是不多的，或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① 胡乔木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20 世纪 3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国文化思想、政治理论演变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胡乔木，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史、党史，特别是党的思想文化发展史。正如邓力群先生所说：“胡乔木作为一个人物，很值得研究。希望有人对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不仅对理解他这个人物有意义，而且对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②

而研究胡乔木，其党史研究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胡乔木一生的奋斗足迹和学术生涯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和宣传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方面的工作更成为他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从 1941 年到 1991 年，胡乔木在党史领域辛苦耕耘了 50 年。对党史工作，他是怀着一种高度的政治责

① 胡绳：《胡乔木和党史工作》，《人民日报》1993 年 10 月 3 日。

② 邓力群：《向胡乔木同志学习》，见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 页。

任感的。1989年他曾对沙健孙先生说：“十三大以后，我已经有可能集中精力面对党史工作了（按：十三大时，他当选中顾委委员，不再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我是愿意承担这方面的责任的。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希望有生之年，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如果病倒了，这件事自然就做不了了，但只要活着，就会尽力干的。”^① 去世前一个月，在病床上他还对妻子说：“我要活到九十岁，我希望做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著作。”^② 只可惜是“弦急琴摧志未酬”^③。他还曾用“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的诗句，表达他一生与党史研究的难解之缘。胡乔木的学术建树和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巨大的，就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胡乔木的党史活动是其一生为党所做工作的重要内容，党史成就是其治学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研究胡乔木，必须研究其对党史研究的成就和贡献。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胡乔木，认识胡乔木。

意义之二：有助于深化对党史学理论的研究

任何学科，都应应以一定的理论和方法作指导。一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学科发展的基础。由于学术界对党史学是政治学科还是历史学科长期存在分歧，再加上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党史学一直不具备自己完整的理论形态和方法体系。加强对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是深化党史研究的现实要求，是党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需

① 沙健孙：《胡乔木同志谈党史工作》，见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② 谷羽：《五十余年共风雨》，见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页。

③ 从胡乔木1982年的《七律·有思》中“江山是处勾魂梦，弦急琴摧志亦酬”一句化用而来。

求。胡乔木关于党史研究和党史编撰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思想，是党史实践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反映了党史学的学科本质和特点，符合党史研究的规律，是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建设的宝贵财富。继承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无疑会大大有助于党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党史学进一步理论化、科学化、成熟化。

意义之三：有助于推动当前的党史研究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更远。效法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2002年，龚育之先生在谈到党史研究应借鉴学习前辈时，指出：“效法乎上，仅得乎中，效法乎中，仅得乎下。所以，要效法上游，效法大家。”接着，龚先生举出可供效法的两个“党史大家”，其中第一个就是胡乔木。^①胡乔木作为学术大家，史学前辈，为我们党史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他不但有深邃的史学思想，丰富的治史经验，还有勤奋刻苦、不倦求索的精神。他的史学思想以其科学性对我们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史学成果以其深刻性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治学经验和成功经历，给我们许多方法和路径的启示；探索精神对我们更是具有榜样的作用。对胡乔木党史研究多方面的继承和效仿，无疑会全面提高我们的史学、史才、史识、史德，使我们对党史学的认识更理性、更准确，研究的目标更明确、方法更科学、态度更积极，从而在整体上推动当前的党史研究。

总之，正如石仲泉先生所说：“胡乔木对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可以用‘博大精深’四个字简单概括。在这个领域，他是一个‘可超不可越’的人物。后人的研究也许可以超过他，但绝不可能绕过他、回避他。从这个意义说，胡乔木的研究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界碑。他对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作的贡献，独特而又

^① 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重要，迄今无人能够比拟。这本身已经构成中共党史学史上的一一个研究对象。”^① 石仲泉先生的这段话简明而透彻地说明了这一课题的意义。

二、研究现状述评

自胡乔木 1992 年去世至今刚刚十余年，目前关于胡乔木的基本文献资料已陆续出齐，但研究还相当薄弱，相关研究成果非常有限。现阶段有关著述的概况如下所述：

（一）著作类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胡乔木传》编写组成立，目前 3 卷本的《胡乔木文集》和 6 卷本的《乔木文丛》已由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乔木文丛》由《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胡乔木谈新闻出版》、《胡乔木谈文学艺术》、《胡乔木谈语言文字》、《胡乔木诗词集》、《胡乔木书信集》6 卷专题文集构成，是《胡乔木文集》的一个重要补充。这其中，1993 年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和 1999 年出版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是有关胡乔木党史研究的核心文献。《胡乔木文集》第二卷按内容分编为 2 辑，其中第一辑属于党的历史部分，收入了胡乔木党史方面的重要著述。《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则在上书的基础上，补充收入了胡乔木关于党史的多次重要讲话，两书一起，基本收存了胡乔木一生在党史领域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章、讲话、谈话、书信，相当全面地记录和展示了胡乔木对党史工作的指导作用和党史研究中的学术成就。再有，2002 年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中的部分信件真切地反映了胡乔木党史方面的许多观点、思想，也是研究胡乔木党史思想的重要文献。这 3 部文献

^① 朱地：《胡乔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思路——访石仲泉同志》，《百年潮》2001 年第 6 期，第 16 页。

性质的书，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和《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两书对研究胡乔木的党史思想和党史活动也相当有价值。《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由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该书是在胡乔木亲自指导和参与下撰写的一部党史著作，是胡乔木以个人回忆为切入点，来写的一部毛泽东思想史，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发展史。该书的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胡乔木同该书编写组成员的20多次谈话记录，内容大部分是对历史事件的回忆，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该书收入了胡乔木的战友、同学、部下、身边工作人员以及他交往的人撰写的81篇回忆文章，其中许多文章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胡乔木的党史工作，特别是胡绳先生的两篇文章和龚育之、郑惠、石仲泉3人合写的两篇文章，专门回忆和描述了胡乔木的党史活动，为我们深入了解胡乔木及其党史思想和党史实践提供了具体、详实的历史资料。

此外，叶永烈的《胡乔木》、曹晋杰的《文采风流话“二乔”》、尚定的《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20年》等文学传记，基本展示了胡乔木的整体精神风貌，初步勾勒了胡乔木的革命人生轨迹，对本课题的研究也很有帮助。

（二）文章类

关于胡乔木党史研究的文章共约有十几篇。这些文章从性质上来说，大部分是资料介绍、纪实回忆性的，研究性的文章很少，有学术分量的更少，只有不到10篇。这几篇有学术分量的研究性文章是：《乔木文丛》编辑组的《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和拓展》^①、石仲泉的《胡乔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思路》^②、程

^① 载《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5日。

^② 见石仲泉著：《我观党史》，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486—595页。

中原的《胡乔木与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①、沙健孙的《胡乔木同志谈党史工作》^②、刘大年的《历史要分析——谈〈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阐述的历史方法》^③和鲁书月的《胡乔木晚年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贡献》^④等。其中石仲泉先生的文章指出胡乔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思路是重视政策研究，这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视角；程中原先生的文章详实地介绍了胡乔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中的作用和贡献；沙健孙先生的文章简要地论述了胡乔木几点重要的党史思想；刘大年先生的文章重点分析了《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中贯穿的历史分析法；鲁书月的文章则初步总结了胡乔木晚年在党史方面较有深度和新意的理论创见。这些文章在胡乔木党史活动和党史思想的研究中做出了拓荒者的贡献，特别是《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和拓展》一文，较全面地对胡乔木党史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作了纲要式的评述，为我们的深入研究打开了思路。

上述关于胡乔木党史研究的著述概况表明：

第一，胡乔木综合文集和专题文集的编辑出版及大量纪实性回忆文章的发表，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文献资料，使我们研究胡乔木的党史实践和党史思想成为可能。

第二，利用上述资料已开始了初步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这些成果在理论和思想上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更多的是在思路 and 视角上给了我们启示。

第三，这种初步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有关著作都属文献资料性质，研究性的著述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而就这有限的几篇文章来说，多是着眼于胡乔木党史思想和党史实践的某一个方面，

① 载《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第13—17页。

② 见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3—60页。

③ 载《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77—82页。

④ 载《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59—64页。

全面论述胡乔木党史研究的文章仅有一篇，即《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和拓展》。而这一篇文章，也因题材和篇幅所限，重在于描述和介绍，缺乏理论的深度与高度。系统地研究胡乔木党史工作的学术专著就更没有问世了，就连有思想和历史深度的《胡乔木传》也还尚在撰写中。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系统全面的胡乔木的党史实践与党史理论的研究还没有起步。

综上所述，关于胡乔木党史研究主要文献资料的具备，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条件；目前研究的薄弱状态，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预留了巨大的空间；研究成果虽然很少，却也为本研究准备了初步的基础，我的《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就是利用这巨大的研究空间，依据基本的资料条件，在上述初步成果的基础之上开始搭建的。

另一方面，由于相关研究的薄弱性和研究成果的有限性，本研究的前期成果相对贫乏，这又必然增加了本课题的研究难度。石仲泉先生就曾说过：“我本人曾经在胡乔木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后来也参加了围绕《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稿的整理和编辑。但是，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乔木同志在这个领域（指党史研究领域——编者注）的思想和见解，是一桩严肃而又需要花费功夫的工作。”^①先生有高深的党史理论素养，有同胡乔木直接接触的经历，尚有如此的感触，以本人有限的学识和功力，对史学大家胡乔木的党史活动和党史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探讨，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三、研究的学术创新性

本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创新性。整体说来，本课题是第一次全

^① 朱地：《胡乔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思路——访石仲泉同志》，《百年潮》2001年第6期，第17页。

面、系统地，也是第一次学术性而非纪念性地研究胡乔木的党史活动和党史思想。具体说来，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探讨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关系，无论对党史研究，还是对胡乔木的研究都是一个新视角。就党史研究来说，自从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在这个领域产生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人们在对研究的客体——历史现象、历史过程进行介绍、分析、总结的同时，缺乏对党史研究者自身，即党史专家、学者的研究，缺乏对他们所研究的领域和成果、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分析、总结。对胡乔木来说，目前的文章大多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评说他，少有从学术的角度去解读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于政治家兼学者的党史研究人员，如胡乔木，介绍文章也应从学术角度入手，说明他在起草两个党的历史决议及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过程中的贡献和智慧。”^① 这是颇有见地的看法。

2. 首次把胡乔木的党史研究历程划分为起步期、奠基期、高峰期、纵深期4个阶段，并概括出每个阶段的特点。

3. 对胡乔木党史理论和党史观点的归纳总结具有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4. 在分析胡乔木党史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时，不仅仅把它放在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历史中进行纵向的考量，而且独辟蹊径地还把它置于胡乔木自身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去进行横向的观察，指出它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一个视角的创新。

5. 充分注意到了党史学史上的两次党史研究高潮对胡乔木党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即不但从贡献的角度论述了胡乔木的党史研究对党史学史的影响，也从成因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党史学史对胡乔木党史研究的影响。

6. 基本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较深入研究中共党史党史上史

^① 谢荫明：《注重党史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第14页。

家与史著的理论框架。

四、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是人物研究，也是理论研究；涉及人物思想，也涉及人物活动，具有理论性强、现实性突出的特点，这决定了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都不能有效地涵盖研究的所有要求，所以本项研究采用了多种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以期能够对胡乔木党史研究之研究更客观、全面、深入。

1. 文本研究法。如上所述，在目前有关的所有材料中，文献资料是最核心、最基础的材料，也是胡乔木党史思想最集中、最真实的反映，所以，材料和选题就决定了文本研究法是本课题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笔者在充分利用这些基本材料的同时，还广泛搜集了报刊上发表的几乎所有有关的文章。我自信，就文献资料而言，本项研究是没有重要遗漏的。在对有关胡乔木文献资料文本解读的方式上，本人尽可能带着“白板”式的心灵去解读它，尽可能不把自己的认知模式、自己预设的观念系统，“嵌入”和参与到具体的解读过程当中，尽可能使自己对它的解读客观些。另外，在文本解读过程中，笔者也总提醒自己尽量避免感情因素的干扰，只服从理性的原则和客观的事实，以力求解读的准确和完全。

2. 历史分析法。这一方法是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在方法论上的体现。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倡导的。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又说：“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② 这一方法要求我们在观察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9页。